

导论 理想： 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发展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重大主题。在致力于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成就，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达到了以往人们难以梦想的生活水平，也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神话：人类完全可以凭借各种技术、立法及其他各种物质力量，解决自己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由于过分崇尚物质力量的作用，强调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人们往往轻视或者忽略物质目标以外的目标、人的内心世界、理想等超越性因素。这种片面性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不仅阻碍着经济的继续增长，捆住了社会发展的手脚，而且导致了人们精神上的困惑、迷惘，引起了人们的极端化行为，这就可能危及人类的未来和命运。而加强对理想问题的研究，引起对理想的重视，既可以克服这一片面性，又可以使人理解发展的真正目的，彻悟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关注和创造人的未来。

1. 理想在工业文明中失落

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形态发展到商品经济形态，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人的自觉选择。与此相联系，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发展为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在否定、扬弃农业文明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它不仅改变了农业社会中人类发展的特点，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变为“世界历史”，改变了“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的特点，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纳入同一轨道，而且改变了农业社会中极其狭隘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扩大了人们社会交往的范围，丰富了人们的社会关系，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依附关系变为平等自由的关系，同时还改变了农业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专制政治被民主政治所取代，蒙昧主义、禁欲主义的文化被享乐主义、“物质第一主义”所代替。工业社会、工业文明以比以往社会发达得多的生产力、丰富得多的物质产品、自由得多的民主政治，来显示自己的优势，表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合理性。

毋庸讳言，工业文明较农业文明有了显著的进步。不过，这决不意味着工业文明是十全十美、尽善尽美的，而是存在着缺陷、有着缺憾的。其缺陷、缺憾的集中表现在于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重“物质革命”轻“人的革命”，重现实轻理想。这一缺陷、缺憾，在西方文艺复兴、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即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它真正成为工业文明的灵魂并最后成为工业社会的不治之症，则是与工业化的出现和推进相联系的。

西方文艺复兴、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将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揭露它们的弊病和罪恶。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反对宗教神学所宣扬的人只有不爱自己，而爱上帝，献身于上帝，才能获得自己灵魂的救赎，返回“上帝之城”的教义，强调人应该爱自己，爱自己的一切；反对宗教神学禁欲主义和“天国幸福”的幻想，强调人应该享受尘世生活幸福，满足自己的情欲；反对宗教神学关于上帝赐予人幸福的观点，强调人应该发挥自己的才能，积累个人的物质财富，自己创造自己的幸福；反对教会的独裁和封建专制制度，强调人应该摆脱一切束缚和限制，实现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反对蒙昧、盲从、对上帝的盲目信仰，强调人应该有理性，自觉地运用理智去独立地对自己的一切作出判断。这一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对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砸烂人身上的精神枷锁产生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它始终贯穿着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精神，将人们的视野局限于人的现实的、眼前的物质生活，使人们对未来和理想难以产生兴趣，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缺陷。这倒验证了弗洛姆的“理性，是人之福，也是人之祸”^①的观点。的确，理性有时也会做蠢事，会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并且在做蠢事时，理性并不觉得自己在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 页。

做蠢事，直到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出现时理性才开始反省自己。西方文艺复兴、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强调的人要关注现实的物质生活，不要关注理想、未来的观念，就是理性所做的一桩蠢事。

如果说西方文艺复兴、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在观念上对人的生活作出错误导向的话，那么以后的工业社会则实践着这一错误导向，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现实的物质生活，重视一切现存的东西，越来越淡漠理想，不理解或者否定理想的价值。人们对现实和理想之间关系的这种态度，我们可以从人们如何对待既是工业社会的基石又是工业文明的内容的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的态度得到说明。

市场经济是工业社会的经济形式，决定着工业文明的本质内容。市场经济把人直接引向了市场，使任何人离开了市场就难以生存，这就势必使人改变自己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重视驾驭、支配市场经济运行的物质条件，关注人的世俗生活。在市场经济中，人是围绕着市场旋转的，是被“看不见的手”所推动的，是被无情的价值规律所左右的，他必须而且优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效率、效益，任何人都没有例外。作为投资者，在资源已经确定的条件下，他要追求投资的最佳化；作为生产者，在既定的生产能力、劳动生产率条件下，他要争取利润的最大化；作为消费者，在既定的收入条件下，他要力求效用的最大化。人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只有掌握和增强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物质力量，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取得主动

权、占有优势。假若一个生产者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在市场上顺利地实现让渡、被消费者所购买，不能实现由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他就会破产。因此，他们重点要考虑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积聚物质力量。由于人们的着眼点在于世俗生活、现实的物质生活，他们就会淡忘人类赋予市场经济的理想，忽视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马克斯·韦伯从独特的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世俗生活是如何离开自己的文化基础、远离人们最初的理想的。他指出：“自从禁俗主义试图重造尘世并在俗世中实现它的种种理想以来，物质财富获得了一种历史上任何阶段都未曾有过的、愈来愈大且最终变得不可抗拒的统治人类生活的力量。……追求财富已经失去了宗教和伦理意义，……确实可以这样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

科学技术是工业社会发展的源泉，是影响工业文明的重要因素。关于科学技术对工业文明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看法。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学技术最初表现为价值理性，是为了把握客观真理，或者是为了反对宗教，或者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价值理性日益丧失，其工具理性日益凸现并最终取得全面胜利，从而，科学技术变成了单一的手段。因此，马克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72～173 页。

斯·韦伯主张限制工具理性，恢复价值理性的权威，使科学技术蕴涵和体现着人的目的和生活意义。雅斯贝斯认为科学技术只提供工具理性，是一种纯粹的手段，它在价值上始终保持中立，本身并无善恶，至于科学技术是用于良善的目的还是用于邪恶的目的，那完全是由人所规定的，因此，他告诫人们：科学技术只能被看作手段，不能被当做目的。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工具理性，只关心实用的目的，并给工业社会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文化领域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科学技术之所以会给人和社会带来危害，是因为它是一种单面性的或者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它对现实只有简单的肯定，没有否定和批判，它不企求摆脱现实的束缚、超越现实、为人的自由解放服务。正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引起的工具理性的横行，使社会变成了单面的社会，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而海德格尔则把“科学技术只是手段”的观点指责为没有认清科学技术的真实本质的肤浅的观念，认为科学技术是与人的生存发展、前途命运密切相联的。然而，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不太重视科学技术的价值理性、对人的目的意义，相反却强调它的工具理性、手段功能。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科技进步，国际经济的竞争在于科技的竞争，而且，科学技术能够使人所面临的一切困境迎刃而解。虽然科学技术的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一方面它引起了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恶化），另一方面它只被人们当做手段对待，因而，造成了人的精神世界、价值理想的

失落。人们研究科学技术是为了增强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产品；人们学习科学技术是为了培养自己更好的技能，掌握获取物质资源的本领。这是人们对待科学技术的根本态度。

大众文化本身则是工业文明的内容。它根本上不是高雅文化，也不等同于“通俗文化”，而是工业社会中特殊的商品。高雅文化、通俗文化虽然形态各异，但都是为了陶冶人的情操，为了寻求超出纷繁烦恼的感性物欲世界的精神世界。而大众文化则是利用高技术手段和现代工业将某一文化作品成批地生产出来，其目的在于营利。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①。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往往使人们看重文化的低品位、低格调，往往使人们亵读神圣、否定崇高、蔑视理想。

工业文明重视现实的世俗生活，强调物欲满足，追求经济增长，因而，它容易导致理想的失落。这种失落，在马克思看来是可能的，因为社会发展或者人的发展的第二大形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任何人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物”，要依赖于“物”，“物”作为极其强大的社会力量制约人们的生活，并且构成人能够独立的首要条件，因而，“物”成了第二大社会形态（或者说工业社会）里人们孜孜以求的对象。美国学者奈斯比

^①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75 页。

特也持这种看法。他在《大趋势》一书中指出，农业社会的人们在时间观念上习惯于向过去看，工业社会的人们则注重现在，信息社会的人们才关心未来。人们注重现在，必定对超越现在的理想没有兴趣。

理想的失落或者人们对理想的淡漠态度，是工业社会所存在的普遍现象，西方世界是这样，中国也是如此。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所失落的理想，既不是宗教神学的理想，又不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也不是西方世界以个人主义为实质的“自由”、“平等”、“幸福”理想，而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完善的理想。

2. 理想的失落造成人的困惑

理想的失落是同人对物欲满足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理想的失落，使人们所剩下的惟一东西就是对物欲的贪求；而人对物欲的贪求，反过来又使人越来越失落理想。理想的失落，是人的根本性价值的失落，是具有绝对性的、终极意义的东西的丧失，使人陷于怀疑、困惑、无望甚至绝望之中。

理想的失落导致了两种影响整个社会生活和人的生活严重后果。其一是实用主义盛行。理想的失落，使人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确定的东西最重要、最值得人去追求。既然人的生活中没有一个规定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的终极目标，那么，人们的眼光自然而然会投向世俗生活，人们自然而然会关心一切存在的东西是否对世俗生

活有用处。实用主义就是要人不要去追求终极价值、理想，而要去关心自己的具体行动。正如宾克莱所指出的：“实用主义的方法，如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所发展的那样，给美国人之关心实际行动而不关心崇高理想提供一个哲学根据。”^①在实用主义者看来，如果人们把全副精力集中在不可能达到的终极的、固定不变的目标或目的上，就不可能为改变现实的环境做出努力；只有人们去真正地关心改变现实环境的手段，才能获得成功、取得进步。因此，人们不需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方，为什么要为到达这一目的地而奋斗，而要着手解决自己所迫切要解决的物质需要问题，只考虑解决物质需要问题的手段的效用问题。

其二是相对主义抬头。“我们的时代常被称为相对主义的时代。”^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时代不承认绝对性的、终极性的东西。在相对主义看来，人们只能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在实际上“怎样行动”而不能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样行动”。因为，任何价值都是相对的，在某一具体的个人、民族、国家那里是合理的价值，对于其他个人、民族、国家来说则不具有合理性。绝对的价值、绝对的标准是不存在的，也是无法达到的。因此，人们追求绝对的、终极的价值的行动是徒劳无益的。而理想是一种绝对性的、终极性的东西，是一种至

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0 页。

② 同上书，第 6 页。

善，它本身就蕴涵着绝对的标准。失落了理想，就必定导致相对主义，就会抹煞行为的好坏之分、善恶之别，就会使人们认为只要是符合自己意愿的就是可行的，用不着去担心或者理会他人、社会的评价。

理想的失落所造成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严重后果，必定引起人的困惑。这种困惑既表现为理论上的困惑，又表现为人们现实生活方面的迷惘。理论上的困惑主要表现在：人应当是什么；人与其他动物究竟有没有区别；人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人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人的自由意味着什么；社会发展的目标是经济增长还是其他；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等等。

理想的失落所造成的人们现实生活方面的迷惘在当代世界表现得尤为明显。不可否认，人们在物质财富的追求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人们在欣赏自己所创造出来的较强的控制自然的能力和充分地享受自己所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的时候，却产生了极度的精神空虚和苦闷，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这是由于人们关于幸福的观念本身具有缺陷。对此，西方人是意识到了的。一位美国学者指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享受美好生活给人带来的舒适和愉快，但我们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假如舒适和快乐的生活就足够了的话，那么有不少的美国人应当说是极度幸福了。”^①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幸福。相反，美国人以及

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11 页。

所有西方人都陷入了痛苦之中，精神不健康，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病症状。美国学者弗洛姆在分析欧洲和北美几个最重要国家的自杀、杀人以及酒精中毒的情况时发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越是接近西方世界的国家，在精神病症状上表现得越严重。他由此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奋斗的目标，难道没有根本性的错误吗？这是否是因为中产阶级富裕的生活在满足了我们的物质需要之后给我们带来了极度的厌烦之感，而自杀及嗜酒则是逃避这种厌烦的病态方式呢？这些数字是否有力地说明了这样的真理：‘人不单靠食物而生活？’这些资料是否表明，现代文明没有满足人的内心需要？”^① 这些问题正好表明了西方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苦恼、迷惘。

人的困惑、迷惘，从消极的意义上看，意味着人怀疑世俗社会和世俗生活，意味着人在金钱和物欲所主宰的社会面前的无能、无力，意味着人在精神上的焦虑、对生存环境的担忧和无望。这些困惑又作为一种心理压力促使人去解除困惑。解除困惑的形式，既有精神上的，又有行为上的，主要有四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人让自己沉入物质享受之中，在灯红酒绿中减轻思想的负荷，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烦恼，不去思考“我是谁”、“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我应当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等超越感性生活的问题。第二种形式是信仰宗教，人通过信教解除尘世的烦恼，求得心灵的慰藉和满足。在西方国家里，虽然

①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8 页。

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是在批判和反对宗教神学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它们并没有彻底改变人们信教的现实基础，相反，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信教的人越来越多。在我国，近几年来信教的人数呈上升趋势，相对发达地区的教徒比相对落后地区的教徒增加得快得多。第三种形式是自杀，它是人在感到难以获得幸福和美好生活，难以摆脱痛苦时，采取的逃避人间烦恼的方式。自杀是与无望相联的，是与理想的失落相关的。自杀问题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严峻问题。它也是当前中国一个刻不容缓必须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南京自杀预防中心 1996 年做的一次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自杀率为 12 人/10 万，平均每年自杀人数在 14 万至 16 万，每天有 400 人左右死于自杀。这些自杀者中，最多的是刚刚踏入社会旅途的年轻人和那些退出人生竞争的孤独老人。^① 第四种形式是与社会对抗。失落理想的工业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无情竞争的社会，它可能使人觉得是一个自己难于适应、难以生存的社会，因而，人们可能把自己与这个社会对立起来，反抗这个社会。人对社会的对立、对抗，既可能表现为如西方荒诞派艺术那样不信奉任何价值，又可能表现为如当代中国的“痞子文学”那样蔑视崇高和理想，否定人对社会的责任，还可能表现为如日本奥姆真理教徒那样对抗社会的实际行为。奥姆真

① 参见《自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载《文明导报》1996 年第 10 期。

理教徒不仅直接与家庭对抗，同家庭脱离任何关系，而且将反抗的矛头直接指向整个社会，迫害无辜者，其最恶劣的罪行就是 1995 年 3 月 20 日制造于东京地铁的“沙林事件”，它导致 5000 多人中毒、14 人死亡，而这一事件仅仅是奥姆真理教组织对抗社会的庞大计划中的一部分。

可见，理想的失落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是无穷的，甚至以人类的毁灭为代价。

3. 人们塑造理想的努力

人失落理想，不仅仅如同无头苍蝇，而且将走进自掘的坟墓。为了避免这一悲惨的后果，为了不因世俗享乐而丧失人类的未来，为了在物质财富的追求中创造一个美好的人的世界，人们反省自己的行为，检讨居于其中的社会和文化，探寻超越单纯物欲贪求的价值和理想。

在探寻、塑造人的理想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两种基本思路：回归和重建。回归反映当代人的怀旧心态和对传统价值的认同；重建则体现当代人的创新意识和对现实的超越。

就回归的思路来看，人们认为当代人之所以陷于泥淖而不能自拔，误入迷途而不知返回，面临困境而将其视为坦途，是因为他们抛弃了传统的价值理念、价值标准。在西方，对传统价值理念的抛弃表现为对“上帝”的否定。“上帝死了（尼采语），一切价值要重估，人不再有终极关怀，不再有信仰，不再有物质财富、世俗享乐以外的东西

值得追求。正是由于当代人只关心实用的目的，关心世俗享乐，而不关心人的内心世界，不关心体现于物质追求上的人生目的、人生意义，人感到极度的精神空虚、痛苦。在持回归思路的人看来，当代人的痛苦、空虚、烦恼与对“上帝”的否定相联系。存在主义者萨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上帝不存在是一个极端尴尬的事情，因为随着上帝的消失，一切能在理性天堂内找到价值的可能性都消失了。”^① 为了确立当代人能够借以安身立命的东西，持回归思路的西方人认为必须请回“上帝”，他们对理想的探寻“把我们当代的许多人引回到过去，他们企图把以往时代旧理想的已经失去的光辉恢复过来”。^② 新儒家也主张从传统价值出发来解决工业社会里人们的精神危机，试图在古代儒家思想中找回终极关怀和道德理想。然而，回归旧理想的思路，从根本上说是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违背的，是行不通的。

就重建的思路来看，人们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具体思路，但它们都是在否定、批判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体说来，人们提出了以下思路。

第一种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思路。持这种思路的人认为，工业社会的问题集中表现为技术问题。凭借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人提高了控制自然的能力，人在自然界面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 页。

② 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35～36 页。

前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地球上众多的物种之一变成了地球的主宰。正是技术引起人与自然的尖锐冲突，出现了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爆炸、粮食危机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这些全球性问题是决定人类命运、未来的因素。由此出发，他们认为，人类的未来将取决于人对自然界、地球的态度和行为，取决于人自身或者“人的革命”。前罗马俱乐部主席奥雷利奥·佩西把这一“人的革命”归结为“人的素质”的提高，而人的素质的提高最终依赖于他的“新的人道主义”。他说：“如果我们不首先清楚地了解得到拯救的惟一通路是通过我称之为用新的人道主义来指导的人的革命，并达到较高的人类素质的发展才能实现，那么，摆脱人类困境就是一句空话。”^①通过“人的革命”，人就可以建立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第二种是建立“后现代世界”的思路。它是后现代主义的思路。后现代主义认为，整个现代世界的秩序之所以四分五裂，整个西方世界之所以出现病态，是因为现代性把价值与事实、真与善美、人与自然、人与人对立起来，“现代性的酸”溶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导致了意义和价值的丧失。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②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现代社会、现代性时总是无情的。当然，

奥雷利奥·佩西：《人的素质》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65 页。

② 格里芬：《后现代科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 页。

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的态度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区别。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福柯等人是从纯批判意义上对待现代性的，有着悲观主义色彩；而罗蒂、格里芬、伯姆、霍伊等人则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上重建人类的理想，这一理想就是消除事实与价值、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立，建立人与地球、人与人融为一体的“后现代世界”。

第三种是建立“健全的社会”的思路。弗洛姆认为，工业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是病态的社会，工业社会中的人是精神不健康的人。这一病态的社会既不能满足人的客观需要，又不能符合人的自我完善的要求，也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因而，我们的任务是医治社会的病态，使之变成一个“健全的社会”。在健全的社会里，人人都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中心，而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活动都服从于人的成长这个目标；按照良心行事被当成基本的、必要的品质，人们无法利用贪婪、剥削、占有、自恋这类品质来获取物质利益或者提高个人的威望；个人积极、负责地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务；个人同他人的关系与他同自己的关系不再分离；人与人团结友爱。“人类只有创造出一个健全的社会，才能保护自己，不致有精神错乱的结局。”^①

人类的出路就在于重建人的理想，这是企求摆脱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困境的人们的共识。然而，所有这些关于理想的探寻，由于它们是直接针对工业社会、工业文明

① 弗洛姆：《健全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2 页。

所造成的消极后果的，所以，一方面难免给人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感觉，另一方面说明了探寻理想的人们只抓住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或几个侧面，而不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发展的必然趋势出发去塑造、确立理想，难免流于空想、幻想。虽然这些对理想的探寻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但是，它们对我们深刻地认识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克服或超越工业社会、工业文明的缺陷，具有启发作用。而且，它们使我们认识到：整个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不能须臾没有理想、失落理想，在我们迈向未来的征途中必须有理想的导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创造人的美好生活。